

明清實學思潮史

陈鼓应 辛冠洁 葛荣晋主编

明清實學思潮史

上卷

齐 鲁 书 社

陈鼓应 辛冠洁 葛荣晋主编

明清實學思潮史

中卷

齐 鲁 书 社

陈鼓应 辛冠洁 葛荣晋主编

明清實學思潮史

下卷

齐鲁书社

责任编辑：张继溱 严茜子
封面设计、题签：王悦玉

明清实学思潮史

(全三卷)

陈鼓应 辛冠洁 葛荣晋 主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15插页 126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33—0108—0

B·23 定价：25.00 元

卷首语

在我1984年第一次回国之前，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刊《中国哲学史研究》曾刊出我的一篇文章。这样，我认识了该刊副主编葛荣晋教授。葛教授从事于王廷相及明清哲学史研究，著有《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王廷相思想研究》和《中国哲学范畴史》。由于我在大学所受的哲学史教育，使我对于宋明理学的道统意识和保守倾向，有相当深的反感。拜读了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之后，我对程朱陆王以外的许多思想家产生了好感，特别是对李贽反道学的异端思想尤为赞赏。在这基础上，我们从讨论对李贽和泰州学派的研究出发，进而扩大到对整个实学思潮的研究计划。我建议请一位国内的前辈学者参加主编，经葛教授的引介，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的主编辛冠洁先生。这样，我们在1985年春天之后就开始拟提纲、组稿、邀请全国三十几位学者——包括哲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专家来参加撰写，并两次举行“明清实学思潮学术讨论会”（1985年7月，北京；1986年8月，成都）。会上，大家对于明清实学思潮的对象、特点、发展阶段及其历史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大多数入仍然认为，实学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思潮。会后，在作者对

初稿修订、补充的基础上，我们对全书作了通盘修订，终于1988年春定稿。全书分三卷，共计一百五十万字。

在我看来，这部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首次提出“明清实学思潮”的概念。在此以前，学者们通常以“早期启蒙思潮”、“经世致用思潮”、“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等说法来概称这一时期的思潮，而我们则称之为“实学思潮”。从中国哲学史来看，每个时代的思想都有其特色，如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近代新学——这都是就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特点而概括出来的称谓。现在，“明清实学”这一提法，已逐渐为学界所接受。（二）本书发掘了许多从未被学界重视或鲜为人知的思想家，如崔铤、唐鹤征、朱载堉、陈第、潘平格、陆世仪、魏禧等等；在资料使用上，除文献之外，还作了不少调查工作，比如对王廷相、吴廷翰等，学者们都到他们的故乡，查阅了族谱和地方志，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资料。（三）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不是单一的哲学史，而是一部综合性的学术思潮史，既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又包括自然科学、考据、政治学等，从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来探讨这一思潮的全貌。（四）在写作过程中，我们还力求避免近几十年来学界的政治色彩和模式化的文风及写作方法，着重阐述思想家本有的命题、概念和思想特点。

1972年左右，我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曾与七、八位朋友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发现意见难以统一，因而合作未能进行。来大陆之后，夙愿未了。通过辛冠洁教授和葛荣晋教授邀请了三十几位各有专长的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学者，终于完成了这一部学术专著，这是海峡两岸学者首次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合作研究的成果。促成这一计划的实

施，首先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教授。

这部书的撰写期间，我主要的精力是花在有关尼采的论著上，因此，编撰工作，从草拟提纲到开会组稿，主要是由葛荣晋教授担当。这部书得以与大家见面，葛教授居功最伟。本书中卷的通稿与引言都是由步近智教授完成的，默明哲先生为本书的完成作了大量的具体工作。讨论会期间，承蒙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教授、副会长石峻、王明教授，及社科院丘汉生教授远道赴会指导，至为心感。本书能够如此迅速地与读者见面，还要感谢齐鲁书社总编赵丙南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张继溱先生的大力支持与辛勤劳动。

陈 鼓 应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于北京

导 论

一、明清实学思潮的特征和发展阶段

从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即从明中叶至清鸦片战争前夕，随着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总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一股反省既往，面向现实的新的社会思潮。有的学者把这一新思潮叫做早期启蒙思潮，有的叫做自我批判思潮，有的叫做经世致用思潮，有的叫做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我们则以明清进步思想家普遍使用过的“实学”这一概念，来涵盖这一社会思潮，把它叫做“明清实学思潮”。这样或许能够更好地表达当时社会“由虚返实”的历史转向，反映这一社会思潮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

“实学”这一概念，有悠久的历史。到北宋，理学家们已较多使用，但理学家使用的实学概念，却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实学。我们所说的明清实学思潮，有其特定的内容和表征。明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所谓“崇实黜虚”，就是鄙弃理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而在一切社会文化领域提倡“崇实”，如“实体”、“实践”、“实行”、“实功”、“实心”、“实念”、“实

言”、“实才”、“实政”、“实事”、“实风”，等等。

“崇实黜虚”是明清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它具体地表现为：

（一）**批判精神**。“崇实黜虚”的时代精神，首先表现在针砭时弊上。不论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还是新兴的市民阶层，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甚至矛盾，但是他们都把批判矛头指向腐败的封建制度及其僵化的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批判思潮。这一社会批判思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思想领域，他们全面地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末流和佛、道思想体系进行批判。这一批判思潮，遍及哲学、经学、史学、伦理、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等方面，从不同角度冲击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闪耀着新的时代的光辉。二是在社会领域，他们针对社会政治的积弊，多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

（二）**经世思想**。“崇实黜虚”的时代精神，落实到现实，即表现为锐意于社会改革的经世主义。为了挽救明代的社会危机，一代先进思想家罗钦顺、王廷相、崔铣、黄绾、陈建、高拱、张居正、吕坤、唐鹤征、陈第等人，不但在田制、水利、漕运、荒政、赋税、兵制、边务、吏治、科举诸方面揭露了当时的各种弊端，而且也提出了各种改革的方案，甚至有的还亲自动和参加了社会政治改革活动（如张居正）。明清之际，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面对“天崩地陷”的严峻现实，反对王学末流的谈虚说玄，提倡士大夫“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治学宗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

副对联是东林党人救世济民的崇高理想。以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君子，编印《皇明经世文编》，其目的也是“资后世之师法”。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王源的《平书》，都是一代“明道救世”之作，特别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惊世骇俗，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芒。清代道、咸年间，龚自珍、魏源等进步思想家，针对当时激化了的社会矛盾，也提出了各种社会改革方案，为后人留下了重要遗产。明清时期的经世思想，虽立足于补偏救弊，但他们与当时理学末流的单凭说教不顾现实的态度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三）科学精神。“崇实黜虚”的时代精神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科学的提倡。明代，由于理学末流空谈性命，不务实学，遂使自然科学陷于冷落、沉寂。尔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再加上“西学东渐”，自然科学开始由沉寂转向复兴。这时，不但中国古典科学技术进入总结阶段，而且也从西方输入了近代科学常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划时代的科学著作。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王锡阐的《晓庵新法》、梅文鼎的天算之学、刘献廷的舆地之学，等等。这是宋明理学衰颓和明清实学思潮兴起的产物。思想敏锐和注重实际的学者，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把注意力放到了自然科学的探索上，不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思想，也开创了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时代新风。

（四）启蒙意识。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的觉醒，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反映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市

民阶层的启蒙意识，表现于许多方面：在土地制度上，他们已突破封建士大夫的“均田”、“限田”说，公开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王源提出的“惟农为有田”的主张，开启了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先河。在经济思想上，黄宗羲、唐甄、王源等人反对“崇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主张“工商皆本”。这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地位的提高这一客观现实的反映。在政治上，他们以民本主义为武器，猛烈地抨击封建君权，多方地限制封建君权，甚至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论点，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企图通过“置相”（即设立宰相，接近于近代责任内阁总理）、“学校”（接近于近代议会）来实现它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理想。顾炎武主张“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提倡“众治”，反对“独治”。唐甄继黄宗羲之后，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人也”，认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在哲学上，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派，竭力阐发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社会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更针对理学的“存理灭欲”的说教，力主理欲统一说，揭露“以理杀人”的本质，从而使封建主义的天理人性论变成具有近代意义的自然人性论。他们蔑视封建偶像崇拜，公开否定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在伦理道德上，他们抨击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特别是君为臣纲。何心隐构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相友而师”的社会。黄宗羲强调臣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唐甄更自标五伦中“我独阙其一（君臣）也”。李塉提出：“思五伦皆有朋友之意乃佳。”以朋友一伦来衡量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含有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在文学艺术上，随着封建正统文艺的衰败，兴

起了一股市民阶层反传统的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徐渭的“本色”论、李贽的“童心”论、汤显祖的“至情”论、袁宏道的“性灵”说等等，都是对一切封建正统文艺的鄙弃。所有这些启蒙意识，都在原则上不同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步思想，它是新兴市民阶层利益和愿望在思想领域的反映。

明清实学思潮遍及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思想范畴。这一思潮有主流，也有支流。它的主流是经国济世，既包括对社会各种弊病的揭露和批判，也包括对拯救时弊方案的构思，包括学术上的“通经致用”和“史学经世”多方面的内容。主要代表人物有高拱、张居正、吕坤、顾宪成、张溥、陈子龙、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王源、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洪亮吉、龚自珍、魏源等人。除这一主流之外，还有这样一些重要支流：（一）市民意识的觉醒。它反映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尤其集中地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主要代表人物有王艮、何心隐、李贽、黄宗羲、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人。（二）自然科学的探索。它既包括对中国古典科学的总结，也包括对从欧洲输入的“西学”的吸收与改造；既包括天文、历法、数学、音律，又包括医学、地理、农业、水利、生物等多种学科。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时珍、朱载堉、徐光启、宋应星、徐弘祖、傅山、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刘献廷等人。（三）考据学和子学的兴起和发展。明中叶以后，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在经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强调子学研究 and “通经致用”的新局面，虽然后来又 被专事训诂名物的汉学所代替，但其影响则是很深远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杨慎、焦竑、陈第、方以智、傅山、顾炎武、毛奇龄等等。明清实学思潮如上所述是由其主流和支流共同构成的多层次的社会思潮。

明清实学思潮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会思潮，而是随着明清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演化。它也如同其它客观事物一样，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鼎盛和衰颓的历史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从明朝正德年间至万历前期，随着明王朝由盛转衰，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的初步展开，从封建社会母体中产生出实质上与理学相对立的实学思潮。这是明清实学思潮的兴起、发展时期。（二）从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中期，我国处于一个“天崩地解”的大动荡时代。封建社会所固有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别是清贵族入主中原和明王朝覆灭而引起的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产生的市民阶层的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再加上“西学东渐”正处于全盛时期，从而把明清实学思潮推向新的高峰。这是明清实学思潮发展的鼎盛时期。（三）从清康熙中期至鸦片战争前期，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摧残，“西学东渐”也处于沉寂时期，再加上清初统治者奉行的推崇朱学和文化专制主义，使明清实学思潮由高潮转入低潮，进入一个曲折发展过程。这是明清实学思潮的低落时期。上述明清实学思潮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将在各卷的《引论》中详细论述。

二、明清实学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

明清实学思潮产生于我国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思想渊源的。

从社会根源看，明清实学思潮是由当时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自我批判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启蒙意识汇合而成的。

做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整个封建社会出现的自我批判思潮，

不同于单独一个封建王朝在末期出现的批判思潮。它既不是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也不是在它的完全崩溃时期，而只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产生。从十六世纪起，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地主阶级面临着比改朝换代深刻得多的总危机，于是地主阶级实行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

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基础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倾轧和斗争也愈演愈烈，整个封建社会机制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中。在此情况之下，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纷纷探讨形成这种局面的症结所在。可惜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找原因，而只能归罪于理学与心学末流的空疏迂阔学风，由此得到的结论是要拯救社会危机，必须首先批判程朱、陆王的“空寂寡实之学”。封建社会的腐败，其原因归根到底在于这种制度本身，学风固然重要，但不是实质所在。当然地主阶级中头脑清醒的士大夫能够认识到转变学风的重要，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在这方面应该说他们有一些十分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虽不能真正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但从提高我们民族和思维水平方面看，却是很有贡献的。王廷相说：“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囁囁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闇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之当天下国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素养，事无素练，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雅述》下篇）王廷相把明王朝所以日衰，完全归咎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末流，虽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但是他指出理学末流束缚人的思想，不能造就有用的人才，

却是击中要害的。

明亡以后，“明朝何以亡？”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吸引着一整代先进学人的思考。与他们的前人一样，他们不可能找到所以然的本质原因，但经过反思，他们深切地认识到理学末流特别是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是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抨击空谈，要求由虚返实，这方面的言论是相当激烈的。例如顾炎武批评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李塨抨击说：“宋明虚文日多，实学日衰，以诵读为高级，以政事为粗豪。……至于明末万卷经史，满腹文词，不能发一策，弯一弓，甘心败北，肝脑塗地，而宗社墟、生民燬矣，祸尚忍言哉！”（《平订书》卷二）

总之，在明亡前和明亡后，进步的思想家反思的中心问题是明朝何以衰、何以亡的问题。他们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从社会发展规律上寻找根本原因，但却从沉痛的历史反思中认识到“实学可以经世”的道理和“崇实黜虚”的重要。由虚返实，“崇实黜虚”，标志着一代学风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反映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和要求，是有重要意义的。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新兴市民阶层的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也在发展。从十六世纪开始，从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中逐渐分化出了独立的手工业作坊，一些城镇也渐渐转变为工商业为其主体。如《苏州府志》云：“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

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佰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俱各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六七六卷《苏州府风俗考》）类似苏州这样的情况，在我国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屡见不鲜。在某些经济作物种植业（如江西新城的种烟业）中还出现了“专靠赁田栽烟”的原始资本主义农业。《明实录》所引曹时聘的奏文曰：在手工业作坊里，“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一）蒋以化在《西台漫记》中亦云：“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在商业中，范濂云在《闲居日抄》中指出：自万历以来，松江“开署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女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在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主者得工，雇者得值”（清乾隆《林县志》卷五）的雇佣劳动。由于明王朝对市民阶层征以重税以及各种专卖政策的限制，严重地阻碍工商业生产的发展，所以，各地不断发生各种形式的市民斗争。如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的江西景德镇陶工起义，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的江西上饶陶工反饥饿斗争，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的临清市民“罢市”，荆州市民反陈奉暴动，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的苏州织工反对税监孙隆的斗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公元1601—公元1602年）的景德镇市民反矿监起义，三十年（公元1602年）的福建商人反税监斗争；天启年间的苏州数万市民反对锦衣卫“凌轹市民”的斗